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

宋镜明 赵春荣

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不仅是中国人民根据本国的实际所作出的最佳选择,而且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40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成就辉煌,社会主义祖国日新月异。但是,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验不多,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也出现过失误和挫折,一些人便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疑虑和动摇,尤其是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乘机明目张胆地否定社会主义。因此,正确认识我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转变论”是 指引中国“革命转变”的理论基础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提出了“不断革命”思想,创立了关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他们不仅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提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而且总结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同时发生”,并预见革命胜利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马、恩的革命转变的科学思想未能实现。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不发达国家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他指出无产阶级负有领导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必须依靠国内革命力量跨越资本主义这道万里长城,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并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可以用赎买和合作社的形式使资本家和农民进入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以马列主义为指南,以中国国情为基点,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丰富了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创立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实现革命转变的新经验。首先,阐明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

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也只有力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其次，指明了过渡时期国内的基本矛盾和历史任务，认为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后的新中国，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党的历史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阐述了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及其作用和发展前途，认为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五种经济成份，其中应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扶助个体经济，组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当发展，“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第四，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可见，马列主义的“革命转变论”是指引中国革命转变的理论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革命转变论。

二、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是 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近代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这是因世界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决定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对立业已构成当代世界新的基本矛盾的形势下，国际资本主义决不容许中国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相反是企图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重新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此以后，中国人民以俄为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革命虽然为帝国主义所反对，却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友好援助；中国革命虽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但更为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而，中国革命发生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代，它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资本主义。

（二）这是由近代中国社会自身矛盾运动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旧中国是一个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这种国情下，资本主义发展成长起来的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内容的先进生产力同国际垄断资本、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等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形成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基本矛盾，并驱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五四”后，这两种矛盾的尖锐斗争造成了日益高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并贯穿于它的整个过程。很显然，只要这个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也就不会结束；一旦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也就必然要转变为新的革命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反帝反封建和土地改革任务的基本完成，引起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大变动，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基本的主要矛盾。而这个新的矛盾，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必然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这是任何外部社会力量所阻遏不了的，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三) 这是中国人民在可能范围内的最佳和唯一抉择。明末清初，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及其缓慢发展，中国也就出现了走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尝试。鸦片战争后，以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曾先后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大同书》和“民生主义”三个方案。他们或者想把中国建成“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世界，或者通过“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这些都失败了，都未能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更未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轨道。旧民主主义历史雄辩证明：资本主义此路不通，中国革命道路需要重新选择。“五四”运动的爆发，划分了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以开天辟地的磅礴气势带给中国以无限生机。由于在众多的阶级和派别中，只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如此明确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且以其坚毅的革命本色和优秀品质及伟大的战略胆识肩负起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掌握着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所以才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革命前途必然是新型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经过多次尝试都失败了的资本主义。事实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叛革命后建立的法西斯专政，只能维护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保持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继续滑向殖民地的苦难深渊。这是对历史的极端反动，是中国人民所决不能接受和服从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中间派别由于其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以及其好幻想易受骗的心理，决定了它们企图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即“第三条道路”）梦幻的破产。“第三条道路”也是一种历史倒退，是中国人民所决不会答应和赞同的。相反，在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不仅中国工人阶级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广大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情深似海，都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早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中国人民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即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因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国富民强之路。

(四)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一切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根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在全国胜利之前，我党就在根据地建立了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并把它作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站”。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新时期。到1956年底，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我国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地实现革命的转变，步入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因为：

1. 无产阶级牢牢掌握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准备了革命转变的根本条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转变论，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最决定性的条件和根本保证就是无产阶级必须毫不动摇、始终坚持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个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不但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思想，而且在革命斗争成败的经验中总结出能够集中代表和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纲领和正

确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掌握领导权、实现革命转变的问题。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同资产阶级可以建立统一战线和主要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无产阶级要真正掌握住革命领导权，必须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同农民的关系，二者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失败和胜利、前进和后退、缩小和扩大、发展和巩固。在对待农民问题上，党从中国80%是农民这一基本国情出发，着重、普遍、彻底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坚决把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与之建立巩固的亲密联盟。事实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就是依靠亿万农民的全力支持和积极参加，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党从中国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它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并与之建立统一战线；在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因为这样，我党一方面批判和纠正了只要资产阶级，不敢发动农民、自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同时也反对和纠正了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农民而使无产阶级陷入孤立和丢失领导权的“左”倾错误。因为这样，我党从只在几十万、几百万人口的解放区有领导权发展到在国统区也有领导权直到取得革命最后胜利。因为这样，不仅亿万农民真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曾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公开声明表示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它决定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和前途，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转变创造了最要紧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个条件，我们就能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并由此造成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条件，我们也就有可能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在解放全国领土的过程中，运用政权的力量，有组织地征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没收全部官僚资本，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一开始就有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基础。

2. 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革命转变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取政权，“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1949年，国民党南京反动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发展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因为这个政权不仅是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执行无产阶级政策，担负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而且同建国初期继续完成民主革命，进而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相适应，所以，“这样的政权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就使我国实现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有了强大的武器。我们完全可以依靠这个武器，“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3. 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建立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了物质基础。一个国家能否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具备一定的但并不都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物质基础论和物质标志论的重要区别。旧中国留给我们的经济遗产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市场萧条、物价暴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毫无保障。建国后，国家分别用管制、征用和代管形式接收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没收了2858个官僚资本企业，使之变为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加上根据地已有的一定的公营经济基础，于是就掌握了整个国

家的经济命脉。同时，通过新民主主义改革，工商业调整和改组，确立了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份中的领导地位，尤其是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权，这是革命转变的物质前提。此外，在老解放区的农村，还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变工队、互助组这些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这种经济在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

4. 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干部，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为革命转变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没有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的自觉奋斗，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与发展。在长期民主革命斗争的考验中，造就了大批会治党善治国、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骨干。他们不仅具有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而且胸怀社会主义事业，放眼共产主义的未来，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充满必胜信心。至于经过新民主主义而获得解放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到党的伟大，无比信赖和拥护党的领导，而且在建国初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大提高了觉悟，成为党领导下的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跟着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大道。

综上所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民步入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某个人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历史和现实的抉择。

三、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不容否定

40年前，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府如鸟兽散的时候，中国向何处？美国国务院和艾奇逊之流曾预言中国只有“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则依然幻想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这是决不可能的。1956年，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也还有人觉得在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缺乏应有的物质基础，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他们或者认为在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未经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历史阶段，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现在应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或者提出我国搞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农业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或者是因为没有历史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论和社会主义建成的物质标志论，忽视了必须从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来考察分析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生产力水平，或者是因为忽视了革命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主要是取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教条主义地遵循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逻辑顺序，或者是因为片面夸大我们在克服小农经济的各种影响的长期艰苦任务中出现的某些失误，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严重歪曲社会主义。因此，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

40年后的今天，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使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时刻，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和政治阴谋家则乘机借改革之名，行“改向”之实，推行其所谓的“四化”（私有化、多元化、自由化、全盘西化），向社会主义中国发动猖狂进攻，企图一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把中国变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国。这种卑劣的罪恶行径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不能允许的，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的40年的历史事实所不能容许的。对于他们的种种反动谬论，我们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予以回击和批驳。

那么，极少数热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不幸”，是历史的错误，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主要论据及其反动实质是什么呢？

首先，他们否定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否定毛泽东同志据以肯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条件，否定本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他们看来，在列宁时代资本主义还不成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达到成熟，现在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时期，而没有向下滑轨。我们认为，必须正确理解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垂死性”的涵意，那就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而不是指帝国主义马上会计日死亡。尽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但社会主义最终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第二，他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鼓吹“精英治党”、“精英治国”论。他们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搞四化可以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为此，他们秘密或公开组成“压力集团”，迫使党做出重大的政治让步，从而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基本路线，都充分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从根本上是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党内个别领导人犯错误、个别党员腐败堕落，这只是支流。以支流来否定主流，全面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是这些“精英”的罪恶目的。

第三，他们打着“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旗号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鼓吹资本主义。他们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标准”出发，无视科学社会主义在于从理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为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客观规律性，无视科学社会主义百年来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已使社会主义社会具备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认为“社会主义至今仍未走完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之路”，没有完全脱离“空想”的境地。在对待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问题上，他们肆意夸大社会主义正在克服的失误和弊端，否定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40年，否定我国10年社会主义改革。他们胡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人类的一大遗产”，“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乌托邦的40年”，中国的改革“已经陷入无法挣脱的困境”，“只有私有化一条路可走”。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煤、钢、石油、发电量等重要工业品产量分别从1949年的世界第9位、26位、27位、25位上升到1987年的世界第1位、4位、5位、4位，1980—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中国为9.2%，发达国家为2.3%，美国、日本分别为2.1%、4%；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中国为9.8%，发达国家为2.3%，美国、日本分别为2.5%、3.8%。“失败论”者常常抓住我们犯过“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抓住在改革和经济工作中我们出现的通货膨胀、高消费、腐败和分配不公等问题加以大书特书、大做文章。然而，这些错误并不是社会主义40年、改革10年历史的全部，它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主流。社会主义制度是亘古未有的新生事物，在其成长过程中出现曲折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符合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失误，就会清晰明了：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恰恰相反，那些背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和货色却遭到可耻的破产。

* * * * *

螳螂挡车，不自量力。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1949年10月，毛泽东同志曾壮志满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平暴后又高瞻远瞩地向全国全世界声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人民相信社会主义中国的航船必定乘风破浪，云帆直挂，向着自己选定的航向奋勇前进，并以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继续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